

每一份热爱都值得全力以赴

——江苏省无锡市政协助力体育产业出圈出彩

通讯员 胡蕊 本报记者 江迪

一路春暖花开，一程春意盎然。3月24日在江苏省无锡市最美的樱花季，有“人在画中游”美誉的无锡马拉松（以下简称锡马）便成了这座城市最大的城市会客厅，讲述着这片热土上的奔跑故事。

马拉松对于一座城市而言意味着什么？自2014年创办以来，锡马累计已有超过28万人次参赛，成为获评中国田协“金牌赛事”和世界田联“金标赛事”的“双金赛事”。2024年锡马共吸引了62.59万人报名，在中国马拉松报名人数历史上名列前茅。10年来锡马一路高歌，已跃升国内顶级马拉松赛事。

锡马的引流能力，绝不止于跑者，其带来的“马拉松经济”表现更为抢眼。2024年锡马产生经济效益预估为2.8亿元。

“马拉松式”履职助力马拉松发展

自锡马诞生之日起，就吸引了无锡市政协和政协委员们持续关注的眼光。委员们持续10年以“马拉松式”履职，持续助力马拉松发展。2015年，十三届政协围绕体育产业开展调研时提出要重点发展马拉松等竞技比赛；2019年，十四届政协提出了《打造永不落幕的全民马拉松——关于放大体育赛事效应提升城市品牌形象的建议案》，围绕放大马

拉松效应进行分析研究，就赛事组织、路线设计、衍生服务、城市文化元素展示等方面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十五届政协每年都收到近10件关于锡马的提案，今年港澳委员们也积极参与到这一话题中来，市政协三次会议期间，来自港澳地区的政协委员马志兴、岑定贤、何伟业建议无锡乘着锡马热，全面发展文化、旅游、消费的多元化融合项目，设计更多具有无锡特色的文创产品，办赛期间要加入不同元素，比如城市嘉年华活动、城市美食节等，丰富和拉长整个锡马，让一天的锡马变成“锡马周”乃至“锡马月”。

如今，这些意见建议经市政府部门吸收采纳，转化为最美的樱花赛道、慧心巧思的“锡马奖牌”、拥有独家记忆的参赛包和完赛包，以及丝滑贴心的各项赛事服务，让五湖四海的跑友汇聚而来，感受无锡专业的锡马态度。

体育产业风起云涌

锡马热的东风，给无锡体育产业发展吹来了繁花一片。近年来，体育产业各大类型在无锡风起云涌，体育制造业“智改数转”步伐加快，涌现出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数字体育经济龙头企业 and 专精特新企业。体育产品的科技创新和产品迭代成果显著，体育新材料与传

感器技术应用广泛，可穿戴式运动装备、智能运动器材与设备、智能运动服饰、智能体质测试器材等新产品备受追捧，体育产业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2023年6月，无锡被确定为江苏省唯一的智慧体育产业城市建设试点。

2023年8月8日，首座无人值守的吴都路体育公园智慧球场闪亮登场。作为全省首批智慧体育产业试点项目，球场由两片篮球场和一片网球场组成，是由“黑科技”赋能的数字化体育场馆。AI算法实时捕捉进球动作、自动剪辑生成多视角带BGM的热血运动视频等功能均为无锡首创。球场通过智慧信息化软件后台，进行数字孪生场馆管理。运行以来，已经有上万名市民在这片绿茵场挥洒汗水、健身锻炼、收获健康。

“这仅是一个起步，接下来我们还要智慧化改造新吴区的锡梅路球场、太湖园球场等，球场规模会更大！”智慧球场的设计运营方、无锡市新吴区政协委员、无锡智慧体育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墨信心满满。

产业前景未来可期

无锡智慧体育产业园是国内首家、全球第四家智慧体育特色产业园。目前入园企业已发展到130多家，2023年产值近5亿元。展厅里，AI

下棋机器人、健身魔镜、智慧骑行平台、VR滑雪等最新研发成果和科技创新项目，每一项产品都体现了智慧体育概念的实际应用。朱墨表示，这些产品丰富了体育训练和健身的形式，并能够吸引更多年轻人参与到体育活动中来，时尚的智体产品也成为了“双十一”大促的爆款，受到Z时代青年的热烈追捧。

农工党无锡市委积极关注体育产业的蓬勃发展，对“体育+”新生态城市建设进行了广泛调研，并在市政协三次会议上作《推进智慧体育城市发展，助力“健康无锡”建设》的大会发言，就引育龙头企业，促进智慧体育产业链完善和协同发展；促进全民参与，助力全民健身的便捷和高质量等提出意见和建议。

市政协副主席、农工党无锡市委主委韩晓枫表示，体育与美好生活相亲近，是建设运动友好型城市和健康城市的重要载体，更是拉动经济双循环的重要手段。今后，要围绕加强政策引导、提升品牌赛事能级、探索“体育+”融合发展，不断做大做强体育龙头企业等方面深入调研，组织一系列协商议政活动，通过提案、社情民意等方式，以更有用的建言资政和更有效凝聚共识，共同唱响体育产业繁荣发展的“好声音”。

第四届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启幕 海南自由贸易港推动开放机遇全球共享

本报记者 李元丽

4月13—18日，以“共享开放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的第四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以下简称消博会）在海南省举办。据悉，作为我国消费品主题的重大国际性展会，本届消博会共有来自71个国家和地区的4000多个品牌参展，展览规模、参展国、参展品牌、采购商和专业观众等均超过往届，创历史新高。

中国银行海南金融研究院研究员云馨慧告诉记者，海南自贸港地处RCEP区域中心，消博会成为RCEP各成员国共享中国开放机遇、开展经贸国际合作的有力见证。消博会作为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消费精品展会，是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有利于各成员国企业探索海南自贸港的市场潜力、扩大在华业务，持续提升国内外互联互通水平。同时，消博会通过共享海南自贸港制度优势，释放高水平开放红利。

云馨慧表示，连续四届的消博会持续带动海南自贸港贸易、投资、营商环境发展，溢出效应持续扩大。在贸易方面，2023年海南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2313亿元，增长15.3%，较全国增速快15.1个百分点，增速居全国第五，连续三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示范效应明显。在招商引资方面，近五年海南实际利用外资年均增长46%，五年引进外资总额超过建省前30年的总和；消博会持续叠加自贸港的生态、区位、政策优势，吸引往届参展商投资海南，推动更多“展商变投资者”，“头回客”变“回头客”；众多企业在海南投资落地，法国路威酩轩集团、瑞士历峰集团、法国开云集团、法国欧莱雅、英国戴比尔斯、美国泰佩思琦等消费品企业加快布局。在营商环境方面，近年来，海南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新增经营主体五年年来年均增长40%，2023年全省存续经营主体同比增长58.16%，增速连续多月保持全国第一；全省存续外商投资企业8494户，同比增长18.61%，增速稳居全国第二位。

“制度型开放是我国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标志。”云馨慧

表示，《海南深化与RCEP成员国合作的十六条措施（2023年）》《海南对标CPTPP开展先行先试试点措施》等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文件陆续出台，推动自贸港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同时，货物、人员入境便利化措施不断优化，推动消博会“买全球、卖全球”的效应日益凸显。海南推出申报、监管放行、简化审批手续等多个方面10项通关便利措施，确保消博会参展人员、物资通关顺畅高效；当前海南实施59国人员入境免签政策，计划在2024年内将国际航线从45条提升至62条，为国际参展商和采购商提供出入境便利；此外，英文版《外籍在琼人士服务手册》和中美、中俄双语版的《境外来琼人士支付服务手册》相继发布，为境外来琼人士提供包括支付便利化在内的生活服务指南。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推动消费从疫后恢复转向持续扩大。同时，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促进消费稳定增长，并提出开展“消费促进年”活动。在云馨慧看来，一方面，消博会是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平台。海南立足于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战略定位，积极发挥双循环交汇点作用，持续提振国内外经济发展。本届消博会共有84个国内外品牌首次参展，英国、俄罗斯、蒙古国、马来西亚等国家首次组织国别展团参展；在采购商方面，来自英国、新加坡、韩国、日本等10余个重点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团和100余名全球头部企业高管将到会参加洽商和签约等商务活动；消博会为优质消费品全球流通提供了重要渠道，也为各国企业共享中国大市场搭建了新平台。另一方面，消博会有助于刺激新兴消费的潜能释放。本届消博会聚焦全球“新、奇、特”消费精品，涵盖先进医疗器械、香化美妆、电子科技等品类，围绕旅游零售、智能家居、绿色金融等热点话题，举办6场主题活动、8场新品首发首秀等特色活动，发布《数字文化消费可持续发展指引手册》等文件，培育壮大新型消费，满足多元消费新需求。

全国政协委员杨士海：

加快数字乡村建设 助推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李元丽

2023年、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均提出“实施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近年各地统筹推进、持续完善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扎实推进乡村治理和农业产业的数字化，基本构建了乡村发展的“数字底座”，在数字赋能乡村振兴战略方面迈出了坚实步伐。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河南省委会专职副主委杨士海在调研中发现，乡村数字化建设仍存在不少问题，如，设施分布不均衡致使发展不平衡。乡村数字化基础设施落后于城市。特别是偏远山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难度大，网络带宽不够、信号不稳等问题比较突出。基层政府对行政管理领域数字化基础设施投入较多，农业产业的数字化投入不足；产业规模偏低影响数字化的推广。许多地方农村产业尤其是种植业总体上规模偏小，导致数字化应用程度低，物联网、大数据等在精准生产、病虫害预警等方面的应用少；人才缺乏制约乡村数字化的推进。数字化应用的主体是新型农民，由于农业劳动强度大、收入低，许多年轻人不愿意从事农业，有知识有技术的专业人才难留住，数字化、信息化相关专家更是缺乏，导致部分数字化终端设施存在重建轻用现象；数据多头采集导致数字化建设重复浪费。基层政府相关部门在推进乡村数字化方面多是各自为政，自行开发平台，资源系统不互通共享，数据重复采集，既加重基层工作负担，又造成资金投入的浪费。

如何加快数字乡村建设，助推乡村振兴？杨士海表示，按照“城乡一体，全域协同”的理念，建议同步推进数字乡村和智慧城市建设，完善乡村新基建体系。规划实施一批数字乡村新基建重大项目，推动城乡同步规划建设千兆光网、5G网络、移动物联网。推动城乡同网同速，加快实现行政村5G和光纤全覆盖。充分考虑人口流动、产业发展趋势，合理布局乡村新基建项目，既要消灭盲点，又要突出重点，确保投入人效益最大化。

为此，杨士海建议：一是产业赋能，推进乡村生产经营数字化。对农业产业数字化进行重点扶持，推动互联网、5G、大数据技术在农业生产上的应用。建立市场供需信息反馈机制，加强对农产品消费的数据采集挖掘，支持精准安排生产经营。鼓励使用环境气候、土壤墒情、作物长势、灾情虫情、农机智能调度等信息技术系统，推动生产标准化、自动化、智能化。构建农业全产业链大数据网络，建立集农产品生产、储存、运输、销售等环节于一体的数据监测系统，推进数字农业工厂、数字农业园区建设。二是突出主体，加快建设数字乡村人才队伍。坚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自培与外引相结合，全面提升新型农民数字化素养，建设适应数字乡村发展的人才队伍。搭建农村数字化培训体系，普及培训新型农民互联网知识和信息化基础技能。与高校、科研院所开展合作，培养一批数字农业农村领域科技领军人才、管理团队、电商直播大V。三是整合资源，提升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加强资源整合，将“数字乡村运营服务中心及综合信息平台”作为“乡村大脑”，统筹云、数、智、网、图等要素，使之与党员教育、综合治理、生态保护、便民服务等平台实现数据算法共享、应用场景统筹，打造集党建工作、产业发展、乡村治理、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智慧平台”，切实消除基础数字壁垒。四是物流匹配，助推农村电商加快发展。进一步完善市县乡村四级物流体系建设，实现物流配送全覆盖，打通农产品流通“神经末梢”。在重点产区建设农产品配送中心、冷链运输、冷库储藏等基础设施，减少配送环节。同时加大政府引导力度，鼓励组建农村电商合作社、电商协会，提高组织化程度，降本增效。



日前，党员志愿者和花农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麻江县谷洞镇兰山村花卉种植基地管护花卉。近年来，麻江县坚持党建引领乡村振兴，通过“党支部+合作社+订单种植+基地+农户”模式，大力发展特色产业，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着力打造“一村一品”“一村一韵”，以花为媒促进农业农村发展。 罗文刚 摄



近年来，北京市密云区河南寨镇大力发展设施农业，探索实践新模式，形成农民利益有保障、集体增收有渠道、金融助力有抓手、企业发展有平台、组织引领有阵地的好产业发展格局。目前，新建设施大棚二百三十九个，实现西红柿销售订单四千二百余万元。图为7月2日，河南寨镇两河村八爱农家庭农场主人杨秋（右二）和村民一起来采摘草莓。 田福良 摄影

全国政协委员王小龙：

让我国数控机床产业“大而强”

张倩 本报记者 范文杰

“工业母机”是“制器之器”和“自强之基”，是关系国家战略安全和发展大局的基础性产业，是衡量一个国家核心制造能力的标准之一，是国家创新能力和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

然而，我国数控机床产业的现状是“大而不强”，产品主要集中在低端和中端市场。”近日，全国政协委员、一工机器人银川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小龙表示，我国要想在制造业领域占据一席之地，必须提高中高端数控机床核心功能部件的自主研发能力。

王小龙介绍，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数控机床产业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使我们在数控机床主机研发生产方面有了很大进

步，但随着全球制造业竞争日益激烈，各国纷纷加大对高端数控机床的研发和生产投入。目前，我国高端数控机床的核心部件，如数控系统、主轴、导轨丝杠、轴承等，很大程度上依赖进口。

“这不仅增加了生产成本，还可能导致供应链风险。”在装备制造行业深耕20多年的王小龙深知，提高关键核心部件的自主研发和生产能力，对我国数控机床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王小龙建议，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集合优势力量，继续加大对关键核心部件研发和生产的政策扶持力度，如提供研发资金、税收优惠等，鼓励企业加大投入，提高自主研发能力。同时，建立产业技术

创新战略联盟，推动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各方共同参与关键核心部件的研发，实现产学研一体化，提高技术创新能力。

加大人才培养和引进是必须动作。王小龙呼吁加大对关键核心部件领域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力度，增加人才储备，为产业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还要推进国际合作与交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提高关键核心部件的技术水平。”王小龙表示，要鼓励引导企业加强品牌建设，提升我国数控机床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拓展市场应用领域，加大对高端数控机床在汽车、轨道交通、航空航天等领域的推广应用力度，促进产业发展。

加强应用型院校校企合作 促进产教深度融合

李俊林

校企合作通过分工协作、优势互补、协同创新，可以加快高校知识产权和科技成果向企业转移转化，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进一步促进产教深度融合，从而最大程度发挥高校作为基础研究主力军、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和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协同效应。

2018年以来，教育部、人社部、发展改革委等国家部委发布了很多涉及校企合作的政策，地方政府也相继出台了落实国家政策的“意见”“规划”“方案”等，但这些政策更多着眼于职业教育发展，专门针对应用型院校校企合作的很少，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有关校企合作的政策多数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从中央到地方，为了有力推动校企深度合作采取了很多激励措施，制定了专门的涉及财政、税收、金融等政策。我国校企合作更多是政府为主导，学校和企业的参与主动性不够强。国外校企合作的制度保障更多选择通过法律、法令的方式来保证实施。

二是我国对于校企合作税收工具的组合应用和详细说明没有具体的规定，也没有关于设立校企合作的专项基金，这也导致校企合作的积极性不高。譬如：针对某一种校企合作形式使用单一的财税工具，缺乏组合工具的使用，可能导致政策效果不够明显；有的财税政策工具提法比较笼统，具体如何应用并没有详细提及。德国、英国等国的校企合作政策包括了税收减免、政府补贴、政府设立专项基金、教育培训费、购买服务、地方拨款、国家下拨给地方税款等。

三是国内的校企合作政策，基本都是围绕职业教育展开，针对高等教育、应用型院校的政策相对较少。应用型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

为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符合行业企业发展需要的高级应用型人才，与高职和中职教育培养一线技术人才的侧重点不同，但其应用型特色决定了其在人才培养中必然不能缺少校企深度合作。

为此，建议：一是制定校企合作的相关法律法规，为校企合作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和规范。应用型高校的校企深度合作，要求政府不仅是校企合作的搭桥人，更应该是一位督导者。通过颁布校企合作专项法律法规的形式，对学校和企业的各自的权利和义务有清晰的界定，提升学校和企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二是合理使用经济激励工具，发挥财税政策的组合效力。校企深度合作涉及的利益主体广泛，宏观上包括学校、企业、行业和政府，微观上包括学校的管理者、教师、学生和企业的管理者、教师、学生和企业的管理者。要协调这么多主体之间复杂的利益关系，单一的财税工具无法发挥出应有的效果，要善于组合使用。

三是设立支持应用型院校校企合作深度合作的专项资金，加大经费投入。应用型院校人才培养的主旨在于服务地方经济，地方政府应严格保障对应用型院校发展的资金投入。中央应用应采取配套性转移支付的形式，适当增加对应用型高校的投入，激励应用型高校深化校企合作。

四是注重政策的落实，避免笼统的提法和缺乏具体的量化标准。每一项政策工具的使用，都应有具体的指标，落实到实施部门、具体责任人，清楚地知道校企合作的权益主体的权利和义务。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民建山西省委会主委）